

名人傳記集粹

趙樣初題



沈醉



梁漱溟



趙朴初



宋希濂



愛新覺羅·溥杰

汪东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梁漱溟“文革”自述.....	(1)
宋希濂“文革”自述.....	(30)
沈醉“文革”自述.....	(52)
宋希濂与瞿秋白.....	(78)
抗日烽火中的赵朴初.....	(106)
程思远忠胆作诤友.....	(127)
从“政治联姻”到恩爱夫妻的爱新觉罗·溥杰夫妇	(139)
邓葆光四十年沉浮.....	(153)
一个女子的传奇——记青少年时代的董竹君.....	(185)
姚美良——爱国侨胞的后起之秀.....	(206)
后记.....	(214)

梁漱溟“文革”自述

作者小记：

作者自1962年至1982年二十年间担任梁漱溟先生所
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秘书，直接保存并搜集了梁
先生的大量言论和史料，并经过多次采访和谈话，写成
16万字的《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经梁先生生前审定后
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在香港三联
书店出版，梁先生本人为书写了序。《梁漱溟“文革”
自述》一文系根据该书和作者掌握的其他第一手材料写
成，为读来亲切可信，本文采用了“自述”的形式。

“文革”期间，作者与梁先生也同在一个单位，其中
“批林批孔”部分完全照作者所保存的原始笔记整理而
成，一字不差。梁先生已于1988年6月在北京病逝。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比较特殊。除去红卫兵
抄家，其他若干次风雨雷电，都是因为我这个人秉性独立思
考好讲真话，自己在公开场合（主要是学习会）主动直言而
招来的。

1953年我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主席的极为严厉的批判之后，曾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组织若干知名人士对我的思想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批判，这些批判发言还专门印成小册子出版。这之后，我本人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长时期潜心读书，闭门思过。但我这人真可以说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吧，对于自己长期以来所索求的人生问题，并没有因为强大的批判压力而丢掉了“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原则，在自己未真正搞通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轻易放弃己见，随波逐流。我在客观上应该感谢的是毛泽东主席虽然以言责我重罪，但在生活上却依旧照顾我，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使我能有条件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探求。使我更加日益高兴的是亲眼看到新中国的稳定统一，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为百余年来的旧中国所远不可及。尤其是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正式宣布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总目标是向大自然开战，发展生产力，这使我越发惊喜，深感百余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实现世界强国的目标有望。但我怎能想到，一年后就发生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反右派斗争，特别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之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阶级斗争还需要进行几百年的理论，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使我惊诧不已！难道中共自己不经过另一次代表大会就这样轻易地扭转方向，丢弃中共“八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吗？随着六十年代初期逐步开展城乡“四清”运动，我的疑惑日益增加。更由于自己多年来好用心思进行分析、观察，且坚持讲真话，我抑制不住自己，便在1963年至1965年之间，在

我每周两次参加的政协直属学习组会议上，特别是在我出席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我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否仍然主宰一切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招来了由上而下的批判，诛我“一贯否定阶级斗争”，“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本性难改”，“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历时一年有余。

时间进入1966年，对我的批判告一段落。我个人依旧每周两次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活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时局的发展。使我吃惊和困惑的是阶级斗争越演越烈，似乎有一种将会更加大动荡的预感在时时震袭着我的心。时至这一年6月1日报载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我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预感终于突发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我在“文革”爆发时的困惑

在6月1日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前后，我所在的政协直属学习组，一直在学习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大家都得作表态性的发言，口头上都说拥护、紧跟，无奈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发展迅速，波及面很宽，使得人人心里打鼓，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危及自身。北京市“三家村”的三个人，大家都认得，有的还是相熟的朋友，何以突然向“三家村”开火，其背景又是什么，谁都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况。我当时面对这些，其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仍百思而不得其解。

大家都表态了，我是一拖再拖，最终也得表态，但我仍拿定主意讲自己的心里话。我在6月7日的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发了言，我心情颇为沉重地说：

“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这种事情（指“三家村”等等）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受。好像是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究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揪出来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道。聂元梓身居其中，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感到高兴。而我们事前茫然，听到这种事还来不及拍手称快，心里有的是不好过、困惑。”

我又接着说：

“现在看，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指彭真）都不行，撤换了，还有一些其他重要人物，都在其中。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问题的关键是，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想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报纸上大文章中的一些分析、批判，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不得圆满的回答。昨天看《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中，有几句话似乎还多少解答了我的这个问题。文章说：‘在一般同志身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就会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

义。’我的理解，这个大个人主义，亦可称之为大个人英雄主义。有了个人英雄主义之膨胀、扩展，那就尽管他在很多地方走的是无产阶级道路，在国家、在党政军诸方面，他可能做了许多事，走了好长一段走得对的道路，所以党才信任他，委以重任，但他终究没有免掉个人主义，还发展为大个人主义，于是就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目中无人，一步步走上了反党的道路。因此即使他有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功。我以为，眼前发生的难以相信的一些人与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

那时候，像我这样对“文革”不理解的实在大有人在。不过当时在政协直属组，多数人仍然不公开讲，处处小心谨慎，多学习，少发言；要说也是照本宣科，免得引出是非。由于我这个人好反思自问，说了这篇与众不同的话，听起来自然大不顺耳。当场学习组里就有人指责我，说什么九十九个功劳，一个大过，完全颠倒是非！诸如邓拓、陆平等，已烂了，只有九十九个过，没有功，即使有一点点，也是做些表面的好事欺骗人的。梁某人说这番话，居心何在，为谁张目？这不正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丘一貉嘛！

然而这一次学习组并没有对我掀起批判热潮。那是因为“文革”的烈火蔓延神速，出人意料，人人都自顾不暇，如履薄冰之感。不久，全国政协机关内部也闹开“革命”了。我们这个学习组很快无人过问，最后红卫兵杀向社会“造反”，把政协的大门都封了，我们学习组的学习也宣告停

止。大家各自回家，心惊胆战地等待着这场“文革”风暴降临到自己头上。

二、发生在我家的红卫兵抄家一幕

1966年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谁，只敲不答，来势汹汹。这之前，刚听说近日外边风声很紧，红卫兵杀向社会打破“四旧”，触目惊心的事处处有发生。我推开家人，亲自打开大门，一看是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怨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我心中已认定，这是一帮热情有余而不通情理的小孩子，又手执“上方宝剑”，如果同他们多说，那准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

接着红卫兵们便翻箱倒柜，搜遍院内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泽东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

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积水潭边上小铜井一号，是一个单独的院落。他们又见我家有电话，一位领头的立即宣布：

“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便把我家中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毕回来，把我关进南房的一

间小屋，在这里我一共住了二十多天，前前后后被折腾无数次。

一开始，红卫兵时时对我诟骂，监督我劳动。所谓劳动，不过是打扫卫生，洗厕所，我虽年逾古稀，但身体很好，尚能担任。他们又命令我减低工资！这本是我早在政协学习会上就提出的，自然一口应承，要他们与政协财务科联系，以配合他们的行动。头一个月的工资真的扣了，是发几十元生活费。反正我终年食素，钱少了也不致于饿死。但后来政协财务科又不扣发了。问何以不扣除？答：接上级通知。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我不便打听，只是心里琢磨，政协、统战部，都已闹得乱哄哄的，负责干部一个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顾得了我们吗？好在这时的红卫兵早到大江南北去进行“革命大串连”去了，家中已无人监督我们，于是照章领取工资的全数。一直到1970年政协学习组恢复学习，才听说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对诸如我以及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在生活上不要剋扣他们，不应扣发工资。细想起来，那时候除了周恩来总理，还有谁能来照顾我们呢？

红卫兵们的抄家最使我痛心的是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

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买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在当时，我心中自然是反对这些作法的。但我

却自嘲自解：许多珍本书籍，本来用处不大，一般在国家图书馆都有保存；至于名人古画，我历来反对附庸风雅，不感兴趣，多年都不曾挂出。因此，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还想到，如果真的是这场不可理解的“革命”的需要，把这些古董玩艺儿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本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瞪了我一眼，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训斥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因为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便挑出来一页页撕着烧……我被罚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心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铸成终生的遗憾呢？

若干天后，红卫兵们忙别的“造反”任务去了，只命令我不准随便出门，要老老实实在北京交代“罪行”——一生的“罪行”，但写了与否，他们却并不过问。我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纸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写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

十分“感谢”红卫兵们这时已心不在此，让我能在这段

非常的岁月中在精神上有所依托，而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活着的重要支柱。

三、我在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议论林彪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政协机关开始军管，军代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政协机关的“文革”斗、批、改，兼管全国政协直接发工资的政协委员。第二年，政协机关的干部和职工绝大部分下放到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去了。当时由政协开工工资的政协委员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蒙冤进了监狱，党内党外的都有；二是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随机关干部去了“五七”干校；三是像我这类的，如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仪、溥杰等人，身体好的在机关从事体力劳动，有的（如我）则主要在家呆着。

到了1970年下半年，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人数比“文革”前少了许多，只有10人左右，除上边提到的外，还有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王克俊、程思远等人，他们也不是一开始而是先后参加这小组的，并先后担任了小组的召集人。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说，中央正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上边提出一个“宪法草案”，让大家内部学习、讨论，还可以提出修改意见。

但那时林彪、江青肆虐正盛，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主持的军代表没有当回事，出席会议的诸公本已是惊弓之鸟，谁还敢去惹新的麻烦？因此大家都说：“宪

草”好，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人人都应该认真学习，提不出什么意见。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中国原有的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只是我这人的老毛病不改，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能略说一二？

“文革”进行了四年多，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却又不敢说。我决意冒险进言。在阅读了发下来的“宪草”之后，我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点，我说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无例外地遵守，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这个“宪法草案”序言中，写上3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硬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把个人的名字写进去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但并不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点，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大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因为林彪之确定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纲的，那么现在写进宪法似乎顺理成章。而不同意这样做，则明显有影射攻击之嫌。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随后便有人提出，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种现行的反动言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此应当场消毒，不准扩散。还有人忧心忡忡地说，这种话要是在外边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小组召集人最后说，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同时宣布，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责任自负。

这一闹腾，我也深感自己的失言。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呢？我甚至想到，眼下的情势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于1953年，因失言而饱受皮肉之苦，甚至进监狱，是不乏其人的。

不料几天之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了上级的意见，说因为是征求意见，则提什么意见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于是我就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一关。

第二年，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当然没有开成，“宪法”自然也流产了。直至1975年初，才召开四届人大，这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了。

四、我在1974年公开反对“批林批孔”运动之始末

1973年10月间，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闹剧开场。江青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罪恶目的是妄图打倒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但这一点，绝大多数善良的人并不知情，我也并不例外。

运动一来，经历了八年混乱的中国老百姓，就再一次被卷入这场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这时候，政协所组织的学习组就不止是直属组了，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总人数有二百多人，分若干小组，统一由政协成立了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负责安排。“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场，大家就不得不“表态”，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还生硬地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我所在的学习小组所有的人都表了“态”，唯有我一言不发。谁都知道，我好赖也是个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稍有研究的人，用当时的话说，是“一贯尊孔”派。我的不发言，很为领导和同组的学友们所注意。其实我那时并不是看出江青有什么阴谋，只是脑子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而且，我越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越是感觉所有的文章、文件，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百的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于这一个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那就还是静观

为好。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到会必到。

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还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我只是笑了笑，当场没有再说什么。又拖了些日子，我不张口是不成了。至1973年12月14日，我才在学习会上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

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会上马上有人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我退了一步，说：

“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我答应作准备。

这期间，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我，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证实了这个消息。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

春节一过，即1974年2月22日和25日，我用了两个半天约八小时的时间，在政协直属组做了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没有人打断我，会场上很安静。我已经二十余年没有登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得到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

我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

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这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国，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良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